



前言

根據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之統計資料，至九十一年度十二月底原住民總人口數為四十三萬二千五百二十六人，十五歲至六十四歲之人口為二十九萬六千三百七十九人，其中女性有十四萬四千二百一十七人，佔四八・七％。她們的年齡層主要是分佈在十五至二十四歲、二十五至三十四歲、三十五至四四歲，其百分比分別是二七・一六％、二四・六六％、二三・六九％；婚姻狀況以有偶者居多，佔五四・六六％，離婚者佔八・三五％；教育程度以小學居多，佔三一・三七％，其次為國（初）中，佔三一・〇一％，再其次則為高中職，佔二四・七七％。另外根據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九十一

年下半年原住民就業狀況調查資料顯示，原住民婦女的勞動參與率是五六・三四％，從事的職業類別中以服務工作人員、農林漁牧業及非技術工等人數最多；未加入勞動市場之原因主要是為料理家務、高齡或殘障、求學及準備升學為主。

然而，這群原住民婦女在過去的原住民運動中，受到尋求本質認同之影響，只被歸為「原住民」，性別於是被隱沒在族群的背後（楊淑玲，二〇〇一）。在婦女運動過程中，則又受到性別同質化之故，女性中族群的差異經驗卻又被漠視。原住民女性作家利格拉樂・阿（一九九九）就曾以「樓上樓下：都會區中產階級女性運動與原住民女性運動的矛盾」一文，來說明原住民婦女的問題與需求在婦女運動中並未獲得解決：

原住民女性就像是樓下（受壓迫）的居民，視野窄（學識不足），但是耐性強、韌度夠，而樓上呢，住的是都會區的中產階級女性運

動者，有比較好的視野（看得多、較遠），雖然也受到樓上（男性）的壓制，但至少她不是最底層的一群。樓層不同、需求不同、訴求也當然不同。（頁九）

因此，原住民婦女不僅因少數族群的身分，處在社會的邊緣位置，並且在強調性別分工的父權體制，因性別與階級又被再度的邊緣化，故面臨的是族群、性別與階級相互建構的壓迫系統，在社會結構中可說是弱勢中的弱勢（Glenn, 1991；許木柱，一九九一；金惠雯，二〇〇一；楊淑玲，二〇〇一）。然而，受到大部分傳媒對原住民的負面報告，以及過去缺乏對原住民婦女的專門研究，無法具體呈現原住民婦女的特性，使得原住民婦女幾乎都要被貼上負面標籤，被與色情、不顧家、偷懶、愛玩、不上進等畫上等號（吳天泰，一九九七）。可是，這些污名化，是從漢民族觀點與父權文化所發展出的刻板印象與歧視。近年來，已有不少針對原住民婦女進行的研究，在此將以這些重要的研究結果為佐證，重新來思考、釐清社會大眾對原住民婦女常見的幾個污名化議題：教育；婚姻；經濟；休閒活動。

由於，原住民大概可分成十一族，每個族群皆有獨特的社會文化與結構，因此在討論原住民婦女的需求與議題，必須考量族群的差異性（邱貴芬，一九九七；蔣麗君，二〇〇一）。然而，隨著臺灣工業化、都市化的快速發展，原住民傳統的文化、結構已明顯的受到衝擊。以世系制度以母系為主的阿美族為例，因受到社會變遷與漢人文化的接觸頻繁，傳統以女性為主的分工基礎已瓦解（鄭香妹，

一九九二；黃美英，一九九七）。在此種情況下，有些現象與問題是原住民婦女共同面臨的，而此部分正是本文要著力之處。不過，某些現象若有族群差異，作者亦會特別說明。

教育：其實我也有努力讀書

教育不僅是一項文化財，亦是一項人力資本財，是弱勢族群改善社會地位的重要途徑（王天佑，二〇〇〇）。換言之，亦是原住民婦女改善社會地位的重要方法。然而，誠如 Mirza（1992）所言，長期以來在論述種族與教育之間的問題，似乎只看到黑人男孩的低學業成就，便以為所有黑人學生有著低學業成就的困難，而忽略了黑人女人在教育上的高成就。此情形在臺灣亦是如此，總以為原住民女性只喜歡唱歌與跳舞，不願花時間追求高學業成就。然而，相關資料顯示事實並非如此。

根據教育部的統計資料，八十八學年度原住民大學生的男女人數比為四十五：五十五（教育部，二〇〇〇）。原住民委員會九十年下半年原住民就業狀況調查發現，教育程度是專科者，女性為八．二％，男性為六．八％；教育程度是大學者，女性為四．一％，男性為四．〇％。譚光鼎（一九九四）、黃茂夫、高淑芳（一九九五）等之研究，亦指出原住民女性學生比男性學生，有較高的學習動機與較好的學習行為。由上述的資料可發現，原住民女性的學業表現

是比原住民男性來得優秀。故，在討論原住民女性的教育狀況時，不應只是將焦點放在原住民的低教育成就，而應把更多的注意力來探討為何有較多的原住民女性能獲得高等教育（楊淑玲，二〇〇一），並努力的在改善其在社會中的階級位階，及部落中的性別位階。

徐玫綺（一九九八）曾針對十名就讀長庚護專的原住民少女進行深入訪談。結果受訪者表示，就讀長庚護專對族人間性別地位的提昇，具有正向的開展契機，以及藉此機會個人生涯規劃的自主性也相對增加。並且此十名受訪者亦表示，弱勢族群女性突破弱勢位置的重要關鍵，在於自身努力掙扎與奮發、適度的妥協、善用既有的資源。楊淑玲（二〇〇一）曾針對十四位日出師院原住民女學生的教育經驗進行探討。研究結果發現，學業成就所賦予的自信與父母積極的教育態度，是促使原住民女學生奮發向上的動力來源，並且大學階段是原住民女生族群意識、性別意識甦醒的關鍵時刻。蔡永強（二〇〇三）曾探究五位臺灣原住民女性教育菁英的生命歷程。研究結果發現，認真求學的態度是促使學業高成就的重要因素，旺盛的企圖心是克服挫折的力量來源。雖然，家長的社經地位會對學業成就造成影響，但是家長積極的教育態度，是克服家庭社經地位不利狀況的重要因素。此外，教師的鼓勵態度是可以協助建立學習自信心，以及對學習產生積極的看法。

由上述可知，原住民女性本身努力與堅持、父母親對子女教育的積極態度、以及學校老師鼓勵與支持的態度，是原住民女性追求，

獲得高等教育的主要因素。並且也透過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學到自我族群的認同，願意積極正向的態度看待自我。故，事實上有些原住民女性為了掙脫種族歧視的桎梏，扭轉個人的社經地位，於是努力的追求高等教育，並且靠著本身堅定的毅力，克服在學校所面臨的種族、性別的雙重歧視。其中，因父母親積極的教育態度，所產生的「家庭連繫」情感，亦是原住民女性對抗種族和性別的重要能量（Harris, 1992）。至於教師的鼓勵，為原住民女性帶來了信心，並產生了對原住民的使命感，而有高度的動機，能持續的努力。

不過，有關原住民婦女接受高等教育的議題上，仍有一個現象是值得進一步探究。那就是在現有的原住民的教育措施中，以及父權文化的體制下，原住民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資源與機會受到限制。首先，政府目前的原住民教育措施中，除了有明顯的種族歧視外，亦充滿了性別的刻板分工。誠如徐玫綺所言（一九九八），保障原住民學生名額甄選或招考的管道，多侷限於技職教育，其中像長庚護專就是只招生女性原住民的重點職業學校之一。因此，在政策制度的結構侷限下，使得多數原住民女性被引導而選擇就讀。此外，以父權文化為主流的思考下，總認為教師工作較適合女性。故，在家人的鼓動與期待下，原住民女性就讀教育學類的比例相當高（高淑芳，一九九九）並且當原住民在參加保送甄試亦選擇師範居多（蔣嘉媛，一九九八）。因此，目前的原住民優惠、保送教育措施雖然提供了原住民女性獲得較多的社會資源，追求較高的教育成就。然而，因學校類型與性別之限制，以及父權思想的束縛，原住民女性追求

教育的選擇權益受到侷限。所以，應取消原住民相關教育措施中的學校類型與性別之限制，以挑戰有性別歧視的父權主義或是族群文化，使原住民女性有機會來發展其潛能，追求更多文化的教育成就。

婚姻與家庭：我是以責任在維繫婚姻與家庭

根據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二〇〇三）的統計資料，九十一年度十五歲以上原住民婦女的婚姻狀況是離婚者，佔七・九三％。九十年度台閩地區十五歲以上因婦女的婚姻狀況是離婚者，佔四・七七％（行政院內政部戶政司，二〇〇一）。兩者相互比較下（請詳見表一與表二），可發現原住民婦女離婚的比例是較非原住民婦女來得高。對於此比較結果的解讀，一般社會大眾容易受到沒有被證實的刻板印象所影響－「原住民婦女性氾濫」，總認為是原住民婦女沒有強烈的婚姻觀，缺乏責任的家庭觀所導致。然而，這並非實情，是缺乏對原住民婦女認識的污名化。

原住民婦女在婚姻中的角色與地位，因族群的不同而有差異。以原住民族群人口數最多的阿美族為例，傳統的婚姻形式是招贅為主，婦女在婚姻與家庭中佔優勢，但也因此必須負起維持家計的責任。在婚後若男人表現不好，女方可休夫。故過去阿美族的離婚、再婚是族種文化所允許的，並不會受到族人的歧視。然而，受到漢人文化的影響，以及先生成為主要的家計者之後，過去「女尊男卑」

的情勢已慢慢改變為「男尊女卑」（許木柱，一九八七）。婦女不僅在家庭中喪失了實質的經濟地位與家長權威（黃美英，一九八七），

表一 九十年度台閩地區婦女十五歲以上人口之婚姻狀況

	總計	未婚	有偶	離婚	喪偶
人 數	8,731,198	2,652,393	4,912,978	416,108	749,719
百分比		30.38	56.27	4.77	8.59

資料來源：行政院內政部戶政司（二〇〇一）

表二 九十一年度原住民婦女十五歲以上人口之婚姻狀況

	總計	未婚	有偶	離婚	喪偶
人 數	158,972	44,849	84,534	12,608	16,981
百分比		28.21	53.18	7.93	10.68

資料來源：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二〇〇二）

亦同時會受到婚姻暴力的威脅（黃淑玲等人，二〇〇一）。

原住民族群人口數第二多的泰雅族，則是父系社會，行一夫一婦的單偶婚制，以男娶女嫁為原則（簡鴻模、鄭穆熙，二〇〇三）。傳統的婚姻制度是家族間利用財貨交換女人的性、勞力與生育，若要離婚時，女方要歸還身價以及提交贖身財，對離婚具有抑制作用（黃淑玲，二〇〇〇）。因此，泰雅族的女人是男人的財產，在家庭中沒有地位，主要是負責家務與子女教養。隨著經濟結構的改變，有些泰雅族需外出工作，貼補家用，也因此對兩性關係的觀念有了改變。但泰雅族的男人仍固守原來文化的男人角色，對兩性認知仍然很封閉。故，泰雅族人婚姻關係的互動有了變化，婦女已慢慢體認了自我，爭取應有的尊重（簡鴻模、鄭穆熙，二〇〇三）。

然而，不論是由母系轉變為父系的阿美族婦女，或是一直以來以父系為主的泰雅族婦女，在王蘭君（二〇〇二）的研究中，她們對婚姻關係之圖像，有一共同的核心概念，即「責任感的婚姻維繫過程」（頁五〇）。換言之，她們對婚姻是有一定程度的責任，不會輕易的放棄她們的婚姻與家庭。據王蘭君的研究指出，原住民婦女對婚姻與家庭的責任有四個部分：婚姻之鑰：她們認為結婚是人生必經的過程，沒有結婚的人就是不負責的人，對族群沒有貢獻。並且有正常婚姻的人，也能享有較高的社會地位。對他（夫）方負責：她們認為應該為自己交往的對象，也就是目前的丈夫負責，不能因為厭倦或討厭他就離開。對孩子負責：她們認定孩子是自己血肉情感的一部分，要有責任顧小孩，即使再苦還是要照顧小孩，

不可以隨意離婚。維持家庭和社會的完整：泰雅族的婦女在出嫁時，都會被慎重叮嚀要善盡妻子的角色，不能讓祖先蒙羞。具有長嗣繼承資格的阿美族或排灣族婦女，為維持家族的發展，對家庭的責任感更重。

另外，在黃淑玲（二〇〇一）等人針對都市原住民婚暴的研究中亦發現，由母系轉為父系的阿美族婦女，因害怕失去子女與母職的責任感，或是為了保護小孩不被先生施虐，即使個人遭受婚暴長期的傷害與威脅，亦不願意離開家庭，脫離先生。其中一位受訪者就提到：「為了孩子，我忍耐著他對我的行為，我沒有對任何人說過這些事情，每個人都以為他是個還不錯的人。」（黃淑玲等人，二〇〇一，頁一三五）。

由上述可知，原住民婦女會因族群文化中對婚姻與完整家庭負責任之規範，本身對丈夫與子女之責任，是以某一程度的「責任感」在實踐她們在婚姻與家庭中的職責，而不會輕易放棄婚姻。相對的，原住民婦女被此責任感控制住。因為，受責任感之故，她們對婚姻、家庭、子女、丈夫付出愈多，相對的被這些角色、責任、付出控制的情況愈多。因此，當她們在維繫婚姻的過程中，亦有壓抑、不安、無奈與痛苦（王蘭君，二〇〇二）。所以，原住民婦女離婚者的比例，較非原住民婦女來得高之原因，應不是她們對婚姻與家庭缺乏責任所致。至於，真正的原因，則需要進一步的探究。在缺乏明顯的證據之前，亦不宜以過去的刻板印象來作推測，而對原住民婦女造成污名化。

經濟：我不是只能做傳統手工藝

從民國四十年代開始，原住民手工藝生產就成為了部落中經濟復健的手段之基調（傅君，一九九八；引述自金惠雯，二〇〇二：一七）。目前的原住民手工藝品的生產者有三種，第一種是純粹追求藝術創作的藝術家；第二種是原住民工藝品工作室；第三種是利用部落中婦女的剩餘勞動力，以工場手工業協作的形式進行（許功明，一九九九）。目前，我們在市面上看得到的小型手工藝品，大多是透過第三種生產方式而來，即利用原住民婦女的勞動力，以貼補家用為由所進行的方式生產（金惠雯，二〇〇一）。也因此，在部落中相繼成立了許多傳統技藝媽媽家政班，教導與鼓勵原住民婦女利用閒暇時間，透過原有的文化技藝來增加收入。如此一來，既可以保留族群中既有的傳統文化，又可以改善原住民婦女的經濟生活。

然而，或許原住民族群的傳統技藝與文化可獲得保存，但原住民婦女的經濟生活是否真的能獲得改善，則是有待商榷。因為，原住民婦女透過手工藝來貼補家用，只會讓原住民婦女在部落中的經濟地位更加邊緣化，使原住民婦女在部落中的從屬地位更加明確（金惠雯，二〇〇一）。更何況，部落中的手工藝品大多沒有通暢的銷售通路，使得原住民婦女在家政班輔導下完成的產品，只好堆在家中，有時連成本都無法回收。如此，只會造成她們的經濟地位更加低落。筆者有次至南部山上的一個部落與原住民婦女進行經濟方面議題的

討論，當地婦女即表示做了一些手工藝，但卻不知如何賣掉，只好堆放在家裏。在金惠雯（二〇〇一）的研究中，有些原住民婦女的先生，甚至對她說：「織一塊布的時間那麼長，又賺不到什麼錢，不如好好的帶好小孩：」（頁二九）。所以，若要改善原住民婦女的經濟生活，應針對其能力做多元的思考，並使其有機會做不同的嘗試。

賴爾柔與林妙娟（一九九六）曾針對阿美、泰雅、排灣與布農四個族群的原住民農家婦女參與家庭經營決策進行研究。研究結果發現，她們在營農的參與權不算太低，並且顯示有愈來愈多的農家原住民婦女成為重要的農場經營者。只是有時會遇到資訊不足、能力不足等困難。所以，她們是希望能透過相關訓練活動，來增強自己經營管理、生產栽培技術以及市場預測等能力。另外，廖秋玫（二〇〇一）針對原住民婦女創業歷程進行探討的研究結果發現，原住民婦女會因個人專才來進行創業，並且以無比毅力來克服所面臨的困難，比如接人家不要的個案。由於，族群同胞是重要的勞動力來源，因此在創業過程，同時協助其他族群同胞適應都市生活。因此，對其經濟生活有明顯的改善，且提高她們在族群中的地位。

由上述可知，原住民婦女是有其他能力來改善她們的經濟生活與經濟地位。可惜的是，由於對原住民婦女的認識不足，以及忽略了在手工藝生產過程原住民婦女的處境，總認為她們是可以透過手工藝來改善經濟。但往往相關活動辦了，經費也用，但卻達不到當初的美意（吳天泰，一九九七）。因此，應該加強對原住民婦女能力

的瞭解，並且透過合理的人才培訓機制，以及相關措施的配合，使得原住民婦女有機會透過不同的能力與方式，來改善她們的經濟生活與在部落中的地位。

休閒活動：我也需要放鬆心情

多數的人到了部落，看到原住民婦女老是聚集商店或小吃店門口聊天、喝酒、唱唱卡拉OK，總是不以為然。心想她們就是愛玩，如果有空閒，為何不從事一些有意義的活動，比如看看書，參加一些活動，或者好好把家裡料理好、把子女照顧好，而不是老往外跑。然而，會有這樣想法的人，通常是以漢人文化的觀點看待與要求原住民婦女，進而產生的污名化。

由於，受到空間距離以及城鄉資源分配不均的影響，原住民婦女可以選擇的休閒場所與活動，十分有限，不像都市婦女可以有多元的選擇，如逛街、看電影、上網、到各類服務中心參加活動或看看書報、雜誌。柯賢城（二〇〇二）的研究即指出，原住民居住的部落是現代生活中的相對落差的位置，書報、雜誌、電腦等對她們而言，是非必要的奢侈用品。更別說，有各類的服務中心等社會資源，可提供原住民婦女相關的休閒娛樂活動。因此，對大部分沒有參與勞動市場的原住民婦女而言，平時的活動空間除了自己的家之外，就是到商家門口，一邊看護小孩，一邊聊天。有時興起，則會

喝酒、吃東西、或者唱唱卡拉OK（王蘭君，二〇〇二）。故，原住民婦女聚在一起聊天、吃東西、喝酒、唱卡拉OK，對她們是較能執行的休閒活動。

此外，到小吃店附設的卡拉OK店唱歌、聊天或是喝酒，對原住民婦女而言，除了是同性朋友聯絡感情的地方，透過彼此之間分享，獲得情感的支持之外，亦是調節現實生活中衝突與壓力的地方。因為，透過酒精、音樂、笑聲情境的搭配，可以產生一種跳脫現實生活的感受，使得壓力得以釋放（王蘭君，二〇〇二）。所以，原住民婦女聚集在一起唱歌、喝酒、聊天，是她們彼此情感交流、放鬆心情重要的空間與活動。至於，原住民婦女能不能或是不是有其他在漢人文化中較「高尚」的普遍化休閒活動，來達到紓解身心的壓力，目前尚未有明確的資料告之。

在張欣萍、高淑貴（二〇〇二）原住民飲酒行為與家庭相關之研究中，是提醒社會大眾去除對原住民飲酒行為的污名化。因為，在其研究中發現，喝酒對原住民家庭具有情感聯繫的作用，並且不是每個人都會喝醉，通常只喝到淺酌或微醺的程度。更何況，唱歌本是原住民的本能、生活習慣的一部分。所以，應尊重原住民婦女原有的休閒活動，而不是以漢人文化的道德觀來評價她們。

結語

在以漢人文化與父權思想為主流的社會，原住民婦女受到種族、性別、階級相互交叉的壓迫與歧視，因此要達到主流社會標準中的生活水平與品質，她們真的是需要許多的協助與支持。因此，我國的原住民社會福利政策是採相對優惠化的觀點，以相對放寬受益條件，增加服務項目，提高給付等方式（李明政，一九九九），來提供原住民的福利服務。只是，在接受服務的過程中，是不是就必須揹負社會大眾給予的污名化？答案當然是否定的。如同吳天泰所言（一九九七），大社會只看到原住民婦女的問題，卻沒想到問題部分可能導源於自己的偏見、刻板印象、污名化。所以，需要藉由更多的研究來認識原住民婦女，來澄清對原住民婦女的污名化，給予她們應有的尊重。

〔註：感謝屏東原住民婦女關懷協會總幹事涂美惠與屏東原住民水噹噹協會理事長高天惠，在寫作過程中，給予的意見與討論。〕

（本文作者現任屏東科技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

◎參考書目：

（一）中文部分

王天佑（二〇〇〇）。原住民女性教育地位取得研究。中大社會文化學報，第十一期，頁八一—一一〇。

王蘭君（二〇〇二）。責任與家庭——東部地區原住民婦女婚姻維繫過程探討。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行政院內政部戶政司（二〇〇一）。台閩地區現住人口婚姻狀況。

<http://www.moi.gov.tw/W3/stat/home.asp>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二〇〇一）。九十年下半年原住民就業狀況調查。

http://www.apc.gov.tw/02_convinent/05_statistics/sta_02.asp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二〇〇二）。臺灣地區原住民相關人口統計資料。

http://www.apc.gov.tw/02_convinent/05_statistics/sta_03.asp

利格拉樂·阿（一九九九）。樓上樓下：都會區中產階級女性運動與原住民女性運動的矛盾。騷動，第四期，頁四—九。

李明政（一九九九）。原住民與社會權。厚生雜誌，第八期，頁二〇—二二。

許木柱（一九八三）。阿美族的社會文化變遷與青少年適應。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所。

許木柱（一九九一）。弱勢族群問題。楊國樞、葉啟政主編，臺灣的社會問題，頁三九九—四二九。台北：巨流。

許功明（一九九九）。臺灣原住民的公藝與藝術及其論述觀點初探。傳統、創新與商機——原住民的工藝世界研討會論文集。台北：臺灣民俗北投文物館編印。

金惠雯（二〇〇一）。編織、部落、夢：原住民婦女手工藝生產之政治經濟分析。私立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

吳天泰（一九九七）。婦女與原住民。婦女與兩性研究通訊，第四十二期，頁一一—二。

邱貴芬（一九九七）。原住民女性的聲音：訪談阿 。中外文學，第二十六期第二卷，頁一三〇—一四五。

柯賢城（二〇〇二）。都市邊緣原住民家庭生活之考察：以三鶯部落阿美族為例。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碩士論文。

徐玫綺（一九九八）。弱勢族群與學校教育—長庚護專的原住民少女。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高淑芳（一九九九）。八十七學年度原住民教育現況調查報告。新竹：新竹師院原住民教育中心。

張欣萍、高淑貴（二〇〇〇）。原住民飲酒行為與家庭相關之研究——以泰雅族、賽夏族為例。農業推廣學報，第十七期，頁五八—八二。

黃淑玲（二〇〇〇）。變調的「naasal」婚姻、家庭、性行業與四個泰雅聚落婦女一九六〇—一九九八。臺灣社會學研究，第四期，頁九七—一四四。

黃淑玲（二〇〇一）。都市原住民婚暴狀況及社工處遇初探——以台北市某社區為例。本土心理學研究，第十五期，頁一一三—一五九。

黃美英（一九八七）。臺灣土著移民的都市適應與人權現況，臺灣土著的傳統社會與人權現況。台北：大佳。

黃茂夫、高淑芳（一九九五）。原住民學生在山地或平地就讀之學習成效差異研究。臺灣省政府教育廳委託專題研究報告。

傅君（一九九八）。活化部落經濟生機——振興原住民族經濟及產業發展。台北：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

楊淑玲（二〇〇一）。破殼而出：十四位日出師院原住民女學生的教育經驗。國立花蓮師範學院多元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蔣麗君（二〇〇一）。從性別差異觀點探析原住民女性知家庭角色。臺灣性學學刊，第七期第二卷，頁六八—八〇。

蔣嘉媛（一九九八）。原住民學生升學優待政策之評估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碩士論文。

廖秋玫（二〇〇一）。台北市原住民婦女創業歷程之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鄭香妹（一九九二）。阿美族婦女地位變遷之初步探討。東海岸評論，第四十四期，頁二八—三五。

蔡永強（一九九三）。山海的女兒——五位原住民女性教育菁英的生命史研究。台北市立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賴爾柔、林妙娟（一九九七）。原住民農家婦女參與家庭經營決策之研究。花蓮區農業改良場研究彙報，第十四期，頁九七—一二二。

簡鴻模、鄭穆熙（二〇〇三）。泰雅族婚姻與家庭初探——臺灣新竹桃山村為例。<http://www.lmcc.fju.edu.tw/laws/native/arti/art%5F01.htm>

譚光鼎（一九九四）。臺灣山胞青少年文化認同、成就概念與學習行為關係之研究。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劃成果報告。

（二）英文部分

Gleen, E. N.（1991）. Racial Ethnic Women's Labor. In Rae Lesser

- Blumberg (eds). Gender, Family and Economy, 173-201. Newbury Park, CA: Sage.
- Harris, D. J. (1992). A Culture Model for Assessing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the African-American Female. Journal of Multiculture Counseling and Development, 20 (4), 158-168.
- Mirza, H. S. (1992). Young, Female and Black. New York: Routledge.